

汉语“波罗盖（膝）”的来源

——兼谈汉语与非汉语的深层接触*

徐丹

[提要] 本文提出现在广泛分布在中国北方方言中的“波罗盖（膝）”一词，其来源不是汉语自身的词，而是源自北方民族的一个底层词汇。该词传播的方式大概是通过女真化的通古斯人群传过来的。历史材料表明，女真人、满族的形成融汇了多元的“部落”成分。语言学的材料显示，汉语北方方言 p-l-k “波罗盖（膝）”的模式很可能来自通古斯语 b-l-g（膝）的模式。而通古斯语的构词方式与其北部地区其他游牧、渔猎民族的语言有深刻的关联。该词很可能与这些语言古老的词根 bul-/pal- 有同源关系。

[关键词] 波罗盖（膝） 通古斯语 底层词

一 引言

汉语的“膝”字由来已久。在现代汉语方言中，除“膝盖”外，还有“磕膝盖、膝头盖、曲膝盖”等不同说法，许多方言里“膝盖”的说法为“波罗盖（儿/子）”。日本学者岩田礼（1986，2007）对汉语“膝盖”的历史演变作过全面、详细的开创性研究，不仅涉及“波罗盖”，还涉及“膝盖”在各方言中的不同说法。

本文讨论“波罗盖”的可能来源和扩散途径。岩田礼（1986，2007）提出，汉语“波罗盖（p-l-k 模式）”里的 p- 当来自“髀”，依《集韵》拟测为 *phak，并认为 p-l-k 的前身是“髀膝盖”，其中“膝”弱化为边音 l-。赵杰（1996:60）认为“波罗盖”的扩散途径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古代的山东汉语就有此词，后传到东北，女真人吸收了，另一种是自古以来，东北人和山东胶东一直有密切的联系，或许是女真人的说法被山东人回流或探亲带回家乡而传开的。但起码是满式汉语。”钱曾怡等（2001:438）指出，“有人释‘波罗盖’为满汉合璧词：‘波罗’来自满语，‘盖’是汉语。但是，早在明朝冯惟敏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波罗盖’”，“所以‘波罗盖’不大可能与满语有关。但‘波罗’确实与满语有关，所以我们怀疑‘波罗’来自满语的前身、更早与汉语发生密切关系的女真语。”赵杰（2010:51）提出，新疆奇台话里的“‘波膝盖子’之‘波’是内地山东‘波罗’之缩写，有的学者考证这是个金代女真语在

* 本研究得到欧盟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 (ERC) Horizon 2020 ERC-2019-AdG 883700-TRAM）及法国国家科研基金 ANR-18-CE27-0013 的资助。写作过程中，Tatiana Bottineau、Angelina Medar 给予俄语帮助，刘可有、王聪、孙瑾帮助寻找珍本文献及相关书籍。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宝贵修改意见和建议。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文中错漏概由笔者负责。

山东的借词保留，山东人闯关东留给东北汉语，以至后来东北汉军旗人进北京都说‘波罗盖儿’。”概括起来说，前人的研究分为两种假设：一种假设认为“波罗盖”来自汉语，“波”来自入声字“髀”，“膝盖”紧附其后，“膝”弱化为边音；另一种假设认为是汉语借用了女真语的词，并保留至今。第一种假设遇到的困难是语音演变比较难以自圆其说，显得有些牵强，岩田礼（2007）指出“有何因素致使该音（即“膝”音，笔者注）变为l-音节，现在无从得知”，从目前所见的汉语音韵演变规律看，还未见到心母字演变或弱化为来母字的例子；第二种假设的困难是到目前为止还未见到有女真语的语言例证。

本文基于所能搜集到的语言事实，初步认为“波罗盖(儿/子)”不是汉语的固有词，而是从非汉语借来并经改造过的词，即“波罗”来自非汉语，“盖”是汉语利用音近挖掘固有语素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波罗盖(儿/子)”是一个合璧词，它应该是从中国北方非汉语借来的词。首先使用这个词的群体很可能是随女真人迁入中原、后来融入汉族的人群。这个词的源头大约来自融入女真人的讲古代通古斯语的群体。

二 现代汉语“波罗盖”的分布

在现代汉语各方言里，“波罗盖(p-l-k模式)”主要分布在山东、东北等地的北方方言里，西北地区也有记录（参见岩田礼 2009:219）。在此，我们略举数例^①：

山东淄川：波落盖 pə luə ke（孟庆泰、罗福腾 1994:84）

山东潍坊：波罗盖/波拉盖/波龙盖/波楞盖/波勒盖（钱曾怡、罗福腾 1992:72）

东北方言：波棱盖儿 bolenggair（许皓光、张大鸣 1988:31）

北京：波棱盖儿，拨楞盖儿（陈刚等 1997:29）

河北方言：波拉盖儿（14个方言点）（李行健 1995:265）

河南洛阳：不老盖儿 pu lə kəu（贺巍 1993:156）

河南郑州：不牢盖儿 pu lau kar（卢甲文 1992:101）

宁夏银川：波勒盖 pə lə kə；波棱盖 pə ləŋ kə（高葆泰、林涛 1993:103）

甘肃武威：波罗盖 pe le kə（王继中 2013:17）

甘肃唐汪话：puə luə ke（徐丹 2014:427）

青海五屯话：polo-gaize（Janhunet al 2008:121）

江苏泰县：波罗盖儿 pə no kəə（张建民 1991:72）^②

从岩田礼（2009:219）绘制的地图可以看到，“波罗盖”主要集中在山东、东北，其次是西北黄河上游地区，分布呈片状。岩田礼（1986，2009）、张树铮（1991）注意到，山西、陕西、山东地区存在“胳拉拜儿、胳棱瓣儿”等不同说法。据岩田礼（1986，2007）的研究，k-l-p为晚出形式，清代以前的文献未见。岩田礼、张树铮都认为k-l-p模式是p-l-k模式的变体，张树铮（1991）认为是“语音换位”，岩田礼（2009:220）提出k-l-p模式被p-l-k模式包围，是一种“周圈分布”，但也认为k-l-p是从p-l-k变来的，是置换作用（metathesis）所致。笔者同意他们的说法。置换作用在多音节语言里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比如英语的ask“问”

^① 例子中的标注（汉字、音标）随原作者照录，声调从略。

^② 有的地方n、l不分，我们也放在p-l-k模式里。

在一些方言里变成了 aks, 法语的 fromage “奶酪”是由拉丁语的 formaticus 演变而来的。由 p-l-k 异变为 k-l-p 符合语音变化规律。汉语的词大多是单音节或双音节, 多音节的词很少。如果是多音节词, 也是有意义的、不同的词或词组构成的合成词。“波罗盖”中的“波罗”有音无义, 各种不同书写用字都表明“波罗”是有音无义的。所以, 可以说这个词的形式不是汉语固有的。据我们看到的山东汉语方言的材料, p-l-k、k-l-p 两种模式都有, 使用 p-l-k 模式的有无棣、利津、平度、潍坊、章丘、淄博、荣成等地, 使用 k-l-p 模式的有泰安、定陶、宁阳、郯城、汶上等地, 而有的地方两种模式都用, 如临沂、济南等。山西汉语方言区的 k-l-p 模式很普遍, 这可能与山西汉语方言使用前缀 ka- 所关联。河北石家庄晋县城关方言还有“屈膝盖儿”(李藏柱、刘建洲 1993:96)^①, 这一用法与崔世珍(1978:239)记录的“曲膝盖”应该是一脉相承的。

三 汉语史中的“膝”“波罗盖”

“膝”在成书于西汉的《礼记》中已出现, 如《礼记·檀弓下》:“今之君子, 见人若将加诸膝, 退人若将坠诸渊。”实际上, 比《礼记》稍早的《山海经》已出现“膝”字:

- (1) 柔利国在一目东, 为人一手一足, 反膝, 曲足居上。(《山海经·海外北经第八》)
- (2) 有钉灵之国, 其民从膝已下有毛。(《山海经·海内经第十八》)

学界认为“波罗盖”的最早用例见于明朝散曲家冯惟敏的作品。例如《海浮山堂词稿·南昌一枝花·月食救护》:

- (3) 软乌刺腿丁骨存了血, 砣柯查波罗盖去了皮。

清朝通俗文学家蒲松龄作品里用“波罗盖”的例句较多, 虽用字有所不同, 但都表“膝盖”。试比较:

- (4) 三更里苦哀哉, 疼又麻难顾追, 十万蛆蚤这波罗盖。(《聊斋俚曲集·磨难曲》)
- (5) 戚老爷丢了刀, 一波落盖跪下……(《襁妒咒》第一回)
- (6) 他出来, 我光着跛髌盖跪着他。(《襁妒咒》第十九回)
- (7) 二相公听的吩咐, 疾忙上去, 一跛髌跪下禀道……(《寒森曲》第七回)
- (8) 曲盘里弯跛^②髌盖(《蒲松龄集·日用俗字·身体章第一》)

冯惟敏、蒲松龄都是山东人, 人们自然会认为他们作品里的“波罗盖”是山东方言。冯惟敏的散曲大量运用方言俗语, 正如王世贞所说“殊乏都雅”“止用本色过多, 北音太繁”(转引自邢永革 2009), 不过这却是研究明代山东方言词汇的珍贵资料。蒲松龄的通俗文学, 为“适应民间演唱的需要, 各曲的语言基本采用方言, 其对白部分的词汇特点与今淄川一带方言十分吻合”(钱曾怡等 2001:318), 尤其是《聊斋俚曲集》《日用俗字》里大量采用口语词汇, 是研究山东方言乃至北方方言宝贵的语料。就上举“波罗盖”而言, 用字随意, 表明无本字或固定字, 可见“波罗盖”是一个口语词、俗语词, 而非书面语, 依据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只用“膝”“膝头”“膝行”“膝下”“促膝”“屈膝”等, 无一例用“波罗盖”, 所以, 可以认为《聊斋志异》用的是当时的书面语而非口语。例如:

^① 作者把“屈膝盖儿”标记为 qúcgàir, 笔者猜测 ci 可能是 xi 或 qi 之误。

^② 句中的小字是路大荒整理《蒲松龄集·日用俗字》时所标。

(9) 道人接置膝上。(《聊斋志异·宦娘》)

(10) 把置膝头，抚摩良久。(《聊斋志异·阿英》)

可见，在蒲松龄的作品中，书面语用“膝”，口语用“波罗盖”。这种口语的用法在明末清初的《醒世姻缘传》和清末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也有记载：

(11) 隔着层夏布裤子，垫的波罗盖子慌，我起来说罢。(《醒世姻缘传》第十回)

(12) 这老妈子把自己的波罗盖儿堵住了二奶奶的谷道。(《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一百零三回)

这种现象在记载口语的文献里所见不多，我们找到一例用“波罗盖”。例如：

(13) 颠的稳，跑的正，要是射马箭，一点往里踏往外捌的毛病儿没有。随着膊洛盖儿顺着手儿动转。(《清文指要》^① (1789年双峰阁刻本) (1809年三槐堂刻本))

查阅早期版本^②，“膊洛盖儿”与满文 buhi “膝盖”对应。后期版本没有“膊洛盖儿”，但是，从现代汉语北方方言“波罗盖”分布较广的现象来推测，“波罗盖”在当时的口语里并没有消失，应广泛地保留在老百姓的口语里。一些民间艺术中存在“波罗盖”，也能说明“波罗盖”是口语、俗语。流行于西北的“贤孝”是一种百姓喜闻乐见的说唱艺术，根据王继中(2013:18)的研究，凉州贤孝《侯梅英反朝》里有“波罗盖”：

(14) 波罗盖上得了个心口子病。

已见到的文献记载和现代方言是吻合的，即“波罗盖”主要流行于口语、俗语。地域主要在山东、东北、西北。传播方式很可能是民间口传艺术，现在知道的有散曲和“贤孝”。早期融入汉族的移民群体也对“波罗盖”这个底层词的传播有所贡献。

四 历史文献反映的民族交融与语言融合

赵杰(1996)、钱曾怡等(2001)的研究都认为“波罗盖”有可能与女真人的语言有关，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文献材料上的证据。从现代汉语方言来看，“波罗盖”分布的地域主要在山东、东北、西北；从文献来看，对“波罗盖”的最早记录为明朝初期。

吴松弟(1997:131、135)指出，金国为了驻守中原、统治当地百姓，曾4次内迁女真人，并依据《金史·食货志》的记载推断，女真人、契丹人和奚人移民及其后裔的总数在中原地区达到了三百余万人。楚刃等(2001:464)指出，女真人曾强迫山西、河北的汉族迁入女真地区，又“几次大规模地从东北等地把女真人迁移到华北、中原、山东、陕西等地，人数多达数百万”，移民里除了女真人，还有契丹人、奚人。爱新觉罗·瀛生(2004:704)认为，“宋、辽、金、元时代进入女真地区的幽燕汉人和其他诸地汉族人，到了明代中期后，可以说完全‘女真化’了……我们完全可以拿金代进入中原汉地的女真人的‘汉化’为比照，因为其理尽同”。从一些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窥见历史上不同人群交往交融引起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的情况。例如：

^① 根据张美兰、刘曼(2013)及竹岳孝(2015)的研究，我们知道《清文指要》有不同的版本。较早的版本是双峰阁刻本(1789年)与三槐堂刻本(1809年)，这两个版本一致，被张美兰、刘曼(2013:2)定为A本。我们注意到，A本不少用语的口语化程度比后面几个版本都高。A本的“膊洛盖儿”，在后来的六个版本里完全不用了。

^② 张美兰教授把她在哈佛大学复印的三槐堂刻本赠送给笔者，在此谨致诚挚的谢意。

(15) 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唐·司空图《河湟有感》)

(16) 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尽能女真语。(宋·陆游《得韩无咎书寄使虜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阁》)

(17) 人烟多戍卒，市语杂番声。(明·白范《蓟州》)

语言的载体是人群，语言随着人群的流动而传播。爱新觉罗·瀛生(2004:675、708)认为现代北京话“源自宋、辽、金、元的幽燕语”，“明代只在辽东地区是汉族居住区，辽东以外，即从开源以北，抚顺以东的今辽宁省东部和北部，以及现在的吉林省和黑龙江省全境，完全是女真人居住区……那里只有女真语”。可见，语言的融合是双向的，尽管某个时期，某种语言是强势语言，某种语言是弱势语言，但是弱势语言对强势语言也会有影响，有时甚至会引起强势语言在句法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对语言的冲击更大、影响更深远(徐丹 2018)。

契丹语和女真语曾有过很深的接触，只不过目前所能见到的材料太少罢了。我们引用的是从宋朝至明朝中国北方地区的历史材料，所涉及到的民族基本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过王朝的群体。元朝历时将近一个世纪，在汉语北方方言里留下了一些痕迹，但从目前所见的材料来看，“波罗盖”与蒙古语族语言没有太多的关联。

根据分子人类学研究的新近成果(Yan et al. 2015; Wei et al. 2016)，爱新觉罗家族的父系单倍群与讲满语、通古斯语人群的典型父系单倍群相差很远，其父系祖先很可能是从黑龙江中上游地区一带迁移而来的，其父系遗传特征与现今达斡尔族的父系遗传特征极为相近。Yan et al. (2015)、Wei et al. (2016)认为爱新觉罗家族祖先与达斡尔族先民属于蒙古高原最古老的群体。我们将在后文看到达斡尔语对“膝”的表达不同于蒙古语族其他语言。

金启琮(1996:205)根据《金史》的记载认为，“金之始祖不是女真人，后入赘女真完颜部，才成为女真人”。同样，“满人”的概念其实也具有一个庞杂的内涵，“满人”里应包括“蒙古人”“通古斯人”以及“被征”服的不同部落群体。辽国被败后，契丹人及其后裔应混入其他族群。同理，金国被败后，女真人及其后裔也应混入了其他群体。契丹人或女真人有的甚至几经“同化”，比如先“蒙古化”、后“汉化”，或先“满化”再“汉化”，等等。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历史上曾是汉族和非汉族接触、交融的地区，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群体都发生过交融。徐梦莘(2008)《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十九引范仲熊《北记》记录了金朝天会四年(1126)关于参战人员的一段对话：“途中与燕人同行，因问：‘此中来者是几国人？共有多少兵马？’其番人答言：‘此中随国相来者，有鞞鞞家、有奚家、有黑水家、有小葫芦家、有契丹家、有党项家、有黠戛斯家、有火石家、有回鹘家、有室韦家、有汉儿家，共不得见数目。’”这很清楚地表明，女真人当时统领了很多其他群体，军队由来自不同群体的人员组成，这些不占优势的群体时而依附于某一强国，时而被某一战胜国“同化”。“同化”的标志之一就是讲强势群体的语言。根据董万崙(1993)的研究，女真人分成不同的部落集团，我们推测这些不同的部落集团里应有讲不同语言和方言的人群。从女真人发祥的地理位置看，历史上贝加尔湖以南至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有大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语言，这些语言属通古斯语。如果当时进入中原的女真人有不同的群体，就有可能讲不同的语言或方言，那么就有必要追寻一下与女真人在同一时期活动的其他人群的语料。同时，还要观察现代满语、通古斯语里是否有 p-l-k 模式的词或痕迹。

赵展(1990:83、87)认为古代通古斯人的发祥地应在贝加尔湖一带，指出迁入内地、定居下来并融入到汉族之中的女真人“与后来的满族没有渊源关系，不能说是满族的祖先”，而

“留居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地区的女真人……才是满族的直系祖先”。可以说，后来的满洲人也是由不同的群体不断融入满洲人主体后形成的。比如清太宗皇太极招抚东海窝集部（即满语的 weji “森林”）时说，“兹地人民语言骑射与我国同，本皆一国之人，载籍甚明（转引自张太湘、吴文衍 1982）”。据戴光宇（2011）的研究，满洲人的来源除了女真人外，还有融于女真人的其他群体。金启琮（1996:205）认为“……爱新觉罗似乎不是满洲的姓氏，这个问题在清代就有人暗中怀疑过，也有人旁敲侧击的记载过，但没有人敢直接说。因为清皇室自然不肯承认自己不是满洲人”。董万崙（1994）指出“明代女真人某一家族的姓氏，与清代满族的姓氏不一定都有承袭关系”。

结合不同领域的材料，对“波罗盖”的来源和借贷方向的调查范围就不能限于女真语、满语，而必须同时关注和这些语言有关系的其他语言。

五 蒙古语族语言、突厥语族语言“膝”的分布

笔者未找到契丹语与“波罗盖”相关的资料。我们先看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与“膝”有关材料，见表 1、表 2。

表 1 蒙古语族语言的“膝”“髌骨”（孙竹 1990）

| 阿拉善蒙古语 | 都兰蒙古语 | 和静蒙古语 | 东部裕固语 | 土族语 | 东乡语 | 保安语 | 达斡尔语 | 词义 |
|--------|-------|-------|-------|--------|---------|-------|---------|----|
| өгдөг | өbdөг | өbdyg | wädäg | udag | odäu | ëbdäg | tualʃig | 膝 |
| tøŋ | tæ:g | tøŋ | arʃag | çidzag | çidziæu | paŋlo | tualʃig | 髌骨 |

达斡尔语“膝”“髌骨”的来源异于蒙古语族其他语言。蒙古语族其他语言或方言的语音形式稍有不同，但属同源词是没有疑问的。13 世纪《元朝秘史》记录的蒙古语“膝”为“额不都克 ebüdüg”（叶德辉 1908:29），现代蒙古语族语言或方言的同源词都由它发展演变而来。

表 2 突厥语族语言的“膝”“髌骨”（陈宗振等 1990）

| 维吾尔语 | 哈萨克语 | 柯尔克孜语 | 乌兹别克语 | 塔塔尔语 | 图瓦语 | 撒拉语 | 西部裕固语 | 词义 |
|-------|------|-------|-------|-------|--------|---------|--------------|----|
| tiz | tize | tize | tiz | tiz | disgek | dyz | daz | 膝 |
| lipek | tize | tize | lipek | tobuq | disgek | arʃəʃəχ | aɦdzəq səmək | 髌骨 |

突厥语族语言的“膝”为同源词。公元 8 世纪鄂尔浑河流域修建的《阙特勤碑》（732 年）和《毗伽可汗碑》（735 年）的碑文代表了古突厥语，在这两个用鲁尼文字刻写的碑文里，用 tiz-“膝”作为词根的词出现 7 次，表达碑文中的主人公如何让战败部落低头臣服、“屈膝”下跪的情况（可参考 Tekin 1968, 1995）。在成书于 11 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Dankoff with Kelly 1984:211；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2002:120）里，“膝”也是 tiz。在回鹘文文献里，tiz 也是表示“膝”（李增祥等 1990:171）。可见，从突厥文、回鹘文到现代突厥语族语言“膝”的语音基本没有发生变化。

很显然，除达斡尔语外，蒙古语族语言和突厥语族语言的“膝”与汉语北方方言里的“波罗盖(膝)”的 p-l-k 模式没有关联，即汉语北方方言的“波罗盖(膝)”与突厥语族语言、蒙古语族语言没有词源关系，可以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

六 满语、通古斯语与达斡尔语的“膝”

一般认为，满—通古斯语族分满语支、通古斯语支。无论是史料，还是语料，表明“波罗盖（膝）”与满—通古斯语族语言有很大的关联，但与满语等没有关联。下面先看女真语、满语、锡伯语“膝”的读音形式，见表3：

表3 女真语、满语、锡伯语的“膝”

| 语言 | 词汇 | 词义 | 材料来源 |
|-----|--------------|--------|--------------------------------------|
| 女真语 | 布希 (bui) | 膝盖 | Kane (1989:320); 贾敬颜、朱凤 (1990:297) |
| 满语 | bui; tobgiya | 膝; 膝盖骨 | Norman (1978:36、278); 胡增益 (1994:733) |
| 锡伯语 | bötk buxw | 膝 | 李树兰、仲谦 (1986:149) |

可以看出，满语“膝”有 bui、tobgiya 两个读音形式，其中，bui 与女真语的一致，与“膝”的 p-l-k 模式相差较远，可以排除其与汉语北方方言“波罗盖（膝）”有瓜葛。乌拉熙春 (1996:324) 指出 t'opkja “膝盖”是满语书面语，与我们讨论的 p-l-k 模式也没有关联。可见，不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未见女真语、满语、锡伯语有 p-l-k 模式的记录。

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是跨境民族，这些民族在俄罗斯有不同的称谓。学者们对通古斯语的调查记录分为两类，中国学者记录的材料里没有 b-l-g 模式，而国外学者记录的材料中，基本都有 b-l-g 模式。下面列出学者们记录的通古斯语的“膝”以及中国境内蒙古语族达斡尔语的“膝”。

(一) 通古斯语“膝”的第一种形式

国外学者记录的通古斯语的语料比较丰富，且编纂了比较词典 (Цинциус 1975) 以及其他词典。从不同词典记录的材料可以看到，通古斯语的一些方言表达“膝”的词有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国内外学者的记录相同或相近，都与 b-l-g 模式的“膝”无关。详见表4、表5：

表4 中国学者记录通古斯语“膝”的第一种形式

| 鄂温克语 (胡增益、朝克 1986) | | | 赫哲语 (安俊 1986) | | 鄂伦春语 (胡增益 1986) | 词义 |
|-----------------------|--------|--------|------------------|--------|--------------------|----|
| 海拉尔方言 | 陈巴尔虎方言 | 敖鲁古雅方言 | 奇勒恩方言 | 赫真方言 | | |
| əŋŋən | hənnən | həŋŋən | хəгəгə; хəгəгə | fəjiŋə | əŋŋən | 膝 |

表5 国外学者记录通古斯语“膝”的第一种形式

| Evenki | Even | Nanai | Oroch | Negedal | Udighe | 词义 | 语料来源 |
|--------|--------|-------|---------------|---------|--------|----|---|
| henŋen | henŋen | peiŋč | heŋŋen; heŋen | heŋŋen | heŋe | 膝 | Цинциус (1975); Starostin et al (2003) |

从表4、表5可以看出，中国、俄罗斯两侧通古斯语的“膝”为同源词，但语音上有细微差别。在语音演变过程中，词首的擦音 h/x 容易脱落，比如中古蒙古语的 hulan “红”，到现代蒙古语词首擦音 h- 已经脱落，变成了 ulan，但达斡尔语、东乡语还保留词首擦音 h-。

赫哲族在俄罗斯一侧自称为 Nanai “那乃”，其使用的语言称为“那乃语”。中国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赫哲族有 5354 人；据苏联 1989 年的人口统计，那乃人有 12000 人（转引自 Janhunnen 2005）。上举“膝”一词，赫哲语为 fəjɪŋə，那乃语为 peiŋč̣，词首辅音由双唇塞音 p- 变成了唇齿擦音 f-（p->f）。

（二）通古斯语“膝”的第二种形式及蒙古语族达斡尔语“膝”的 b-l-g 模式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国外学者记录的通古斯语“膝”的第二种形式，即 b-l-g 模式。这一模与汉语北方方言“波罗盖”有关联，见表 6：

表 6 国外学者记录通古斯语“膝”的第二种形式^①

| Evenki (俄罗斯) | Even (俄罗斯) | Nanai (俄罗斯) | Solon (索伦语) (中国) | Negedal (俄罗斯) | Udighe (俄罗斯) | 词义 |
|---------------------------------|---|--------------------------|----------------------------|------------------|------------------------|------|
| бэлгэ [bɛlɣɛ]; болго [bolɣo] | бэлгэ [bɛlɣi]; бэлгө [bɛlɣə]; бэлгэ [bɛlɣɛ] | бэлгэ [bɛlɣɛ]; bilōki | болохи [boloxi]; bolōxi | бэлгэ [bɛlɣɛ] | bäluga; бөло [bɔlo] | 膝/髌骨 |

从表 6 可以看出，中国、俄罗斯毗邻地区通古斯语的“膝/髌骨”都是一个模式，即 b-l-g 模式。岩田礼（2007:128）搜集到的汉语山西方言的材料，如山西太原柴村的 pyu li kai tsə [玻璃盖子]“髌骨”，其模式为 p-l-k，与通古斯语的 b-l-g 模式属同类。

表 6 中通古斯语“膝/髌骨”的 b-l-g 模式，与汉语北方方言“波罗盖(膝)”的 p-l-k 模式有明显的词源上的联系，且词义完全相同。国外学者把中国境内索伦语（鄂温克语）的“膝”记录为 boloxi，但笔者未找到中国学者记录的有关材料。国外学者调查的那乃语材料里，记录了“膝”的两种变体，其中 Цинциус（1975:123）记录为 bɛlɣɛ，但在中国境内的赫哲语里却不见这种形式的有关记录^②。

依前面的论述，汉语“膝”的 p-l-k 模式和非汉语“膝”的 b-l-g 模式应有关，而非来自古汉语。通古斯语的例证表明，非汉语的 b-l-g 模式曾在中国的东北、山东、西北流行，经融入汉族的人群把 b-l-g 改造为汉语的 p-l-k，词义相同。再看达斡尔语的 b-l-g 模式，见表 7：

表 7 达斡尔语的“膝盖骨；髌骨”“膝盖”的形式

| 达斡尔语 | | | | | 词义 |
|----------------------|-----------|-------------|----------|--------------|--------|
| 开英 1982 ^③ | 恩和巴图 1983 | 胡和 1988 | 仲素纯 1982 | Тодаева 1986 | |
| bolukê | bolookii | bolokie yas | | bilōki | 膝盖骨；髌骨 |
| tualqig | tualqig | | tualfjig | | 膝盖 |

从地理分布来看，达斡尔语夹在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之间，这自然会受到来自蒙古语、通古斯语两方面的影响，所以达斡尔语应兼有蒙古语、通古斯语的特点。Тодаева（1986:1）指

^① 表中材料出自不同的词典（见参考文献），其中，斯拉夫字母记录的词照录后用国际音标转写，各种不同变体的记录也照录，方括号里的转写是为了方便读者进行比较。已用拉丁字母记录的词照录不作转写。

^② 俄国人 P. 马克曾在西伯利亚进行了 27 年的调查，其间，他曾多次到中国黑龙江、乌苏里江地区考察和旅游，并于 1859 年出版《黑龙江旅行记》。在 P. 马克（1977:2、473-474）记录的词里，西伯利亚地区两种通古斯语的“膝盖”为 öŋon、gohi、höŋon。这种记录与今天中国境内的通古斯语一致，属第一种形式。

^③ 开英（1982）记录的是新疆的达斡尔语。

出,最初学者们认为达斡尔语是受蒙古语强烈影响的通古斯语,但后来一致认为,达斡尔语是受到通古斯语影响的蒙古语族的一种语言。达斡尔语“膝、膝盖骨”的**b-l-g**模式与蒙古语族其他语言相差甚远,而与通古斯语同源,这就是很好的说明。中国东北的中、俄边境地区“膝、膝盖骨”**b-l-g**模式的分布也能说明问题,见图1(粗体表“膝”有**b-l-g**模式):



图1 中俄边境“膝”**b-l-g**模式的分布

从图1可以看出,“膝”的**b-l-g**模式主要分布在中俄边境地带及俄罗斯远东地区(Even)。在中国境内,国外学者记录“膝”的**b-l-g**模式只见于鄂温克语(索伦语)、达斡尔语。胡增益、朝克(1986)记录的鄂温克语里未见“膝”的**b-l-g**模式。鄂温克语(索伦语)属通古斯语,“膝”有**b-l-g**模式很好理解。相形之下,达斡尔语在蒙古语族中的地位就显得比较特殊,仲素纯(1982)记录的莫力达瓦达斡尔语里未见到“膝”的**b-l-g**模式,但是开英(1982:45)、恩和巴图(1983:20)、胡和(1988:27)都记录有“膝”的**b-l-g**模式。Тодаева(1986:6)认为达斡尔语的特殊之处是存古特征较多。达斡尔语里既有通古斯语的底层词,又有蒙古语的古老词汇。“波罗盖”是汉语北方方言从少数民族语言借进来的,还是由汉语北方方言传播到少数民族语言中去的?下面作进一步讨论。

七 “波罗盖”的借贷方向

通过上文提供的语料,可以看出汉语“膝盖”的**p-l-k**模式与通古斯语“膝盖、髌骨”的**b-l-g**有关联。这很可能在元代之前就已经存在,其传播地域为中国的东北、山东、西北地区。我们初步认为传播“膝盖、髌骨”**b-l-g**模式的人群,很可能是融入到女真人、曾讲某种通古斯语、但是后来又融入到汉族中的人群。从今天“波罗盖”一词的分布看,汉语北方方言以及中俄边境毗邻地带的语言都有“膝盖”的**p-l-k**或**b-l-g**模式。上文我们已经讨论了语言接触的外在因素,下面进一步分析语言的内在规律——构词法。

从汉语的历时构词法来看,中古汉语的复辅音已经消失,所以“波罗”不大可能是来自中古汉语的复辅音。与“波罗”语音形式相似的词如“菠萝”“波罗蜜”“波棱菜(菠菜)”。这些词都是随域外物种引入带来的新词。例如:

(18) 摩伽国献菩提树。一名波罗。(《唐会要·卷一百·杂录》)

(19) 遣使献波棱菜浑提葱。(《唐会要·卷一百·泥婆罗国》)

汉语里的大多数多音节词,都是由有意义的语素组合成的,如“门把手”“手巴掌”“扫帚星”“窝囊废”,等等。当然也有由无意义的语素组合的词,如“波罗”“葡萄”“玛瑙”“菩提”等一些外来词。涉及“膝盖”的“波罗”一词,只是语音的记录,而且记录语音的汉字

形式不一,如“波罗”“波棱”“拨楞”“波拉”“波勒”“波龙”“波楞”“膊洛”“跋棱”等。蒲松龄就用过“波落”“跋骼”两种记音形式。这些实例表明,“波罗”这个词无本字,汉字只是用来记音而已。虽然“盖”赋予了“波罗盖”一定的意义,但不能解释“波罗”的来源。

通过上文通古斯语的例子可以看出, *p-l-k* 或 *b-l-g* 在汉语里找不到类似的构词方式,但在通古斯语里却可以发现 *p-l-* 或 *b-l-* 是一个有共同意义的词根形式。这个词根在不同的语言里除了“膝盖”义外,还和“脚、腿、胫骨、脚底、掌、步”等意义有联系(参见 Иллич-Свитыч 1984:66-70)。

汉语山西方言的“胫骨”有 *p-l-k* 模式。如: *thuei pəʔ lɛ kuəʔ*[腿不擦骨]“胫骨”(岩田礼 2007:128)。其中, *thuei* “腿”是汉语词, *pəʔ lɛ kuəʔ* “不擦骨”显然与 *p-l-k* 模式有关。可见,这个模式与通古斯语如出一辙,除了在某些方言里表达“膝盖”义外,在另一些方言里也可以表达“髌骨”“胫骨”义。从通古斯语和今天汉语山西方言的词义仍然对得上的情况来推测, *p-l-k* 或 *b-l-g* 模式是由一支或几支讲通古斯语的群体传播而来的。

前文表 6 表明, *b-l-g* 模式表达“膝”义是通古斯语甚至是北方其他民族语言通用的词。如果认为是汉语借给这些在中国北方及中俄毗邻地带的群体,甚至西伯利亚、俄罗斯远东地区不同的群体,那就很难解释为何汉语没有用类似的构词方式造的词,而这个构词模式在通古斯语里有派生能力,即由一个词根衍生出许多相关意义的词汇。这是黏着语的典型特征。汉语的 *p-l-k* 模式只限于“膝盖”义,且无固定的汉字表达。如果扩大考察范围,可以看到 *p-l-* 或 *b-l-* 在一些语言里是一个词根,用来表达“脚、腿”部位。如韩国语的 *par* “脚”, *-r* 和 *-l* 是音位变体,该词可能与 *b-l-g* 或 *p-l-k* 模式同源。再如叶尼塞语系 Ket 语的 *būl* “腿、脚”(Vajda 2004:92)。这表明,在东北亚的一些语言或方言里,曾经存在过一个表达肢体部位的共同词根 *bul-/bel-/pal-*。通古斯语的 *b-l-g* 模式和这个词根应有关联^①。如果说是北方民族借入汉语的 *p-l-k* 模式用来表达“膝盖”“髌骨”,显然违背常理。从构词法看,“髌骨”“胫骨”很难说是由汉语的 *p-l-k* 模式派生出来的词,而在北方一些民族语言里, *b-l-(g)* 模式有不少派生词。

我们还应注意两个事实:第一,北方一些民族语言里,“脚”“腿”通用一个词,如锡伯语 *bətk* “脚”“腿”(李树兰、仲谦 1986:16),保安语 *kəl* “腿”“脚”(陈乃雄 1986:235、341)。第二,突厥语的一些语言用 *bilek*、*bilek* 表“手臂”,而通古斯语里类似的形式则表“膝盖”“腿”;突厥语的一些语言用 *qol*、*xol* 表“手”,而蒙古语类似的词 *kəl*、*xəl* 则表“脚”。这种非随机地“互换”意义的表达方式,说明这些表达肢体的词应同源,且有古老的来源。

八 初步结论

本文认为汉语北方方言普遍使用的口语词“波罗盖(膝)”不是来自汉语自身,而是同非汉语深层接触的借词。根据现有材料,我们初步认为,这个词大概是一个或几个融入女真人,后来又融入“汉人”的讲通古斯语的人群传播的。Janhunen (2005:38) 认为金代以前,女真语与通古斯语就分道扬镳了。戴光宇 (2011:48) 根据国外学者研究的结果,指出以前乌苏里江一带的部落虽然受到女真人的强烈影响,但其语言应属通古斯语支的次支,而不属满语支。

^① 匿审专家认为“波罗盖”可能来自汉藏语的 **put*>*pul*, 而通古斯语的 *belge* “来自汉藏语的 **put* 可能性更大”。谨此致谢! 根据史料和语料,笔者认为“波罗盖”是由北方民族语言传入汉语的。

任何一个群体占主导地位时,其他依附的群体会习得“主流”语言,即通用语,但其母语底层词汇不会立即消失,相反,有的会长时间留在通用语里,久而久之人们把留在通用语里的底层词汇改造或吸收为基本词汇。汉语北方方言“波罗盖(膝)”就是很好的一个例证。

通过不同学科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汉语北方方言“膝”的p-l-k模式与通古斯语,甚至东北亚地区诸民族语里“膝”“腿”“脚”“肢体”的b-l-(g)构词模式有密切关联。本文的讨论旨在抛砖引玉,更多的证据材料还需进一步挖掘。

参考文献

- [1] 爱新觉罗·瀛生. 2004.《满语杂识》,北京:学苑出版社.
- [2] 安俊. 1986.《赫哲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3] 陈刚. 1985.《北京方言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
- [4] 陈刚、宋孝才、张秀珍. 1997.《现代北京口语词典》,北京:语文出版社.
- [5] 陈乃雄. 1986.《保安语和蒙古语》,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6] 陈宗振、努尔别克、赵相如等. 1990.《中国突厥语族语言词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7] 楚刃、王振芳、马玉山等. 2001.《山西通史·卷四·宋辽金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 [8] 崔世珍. 1978.《老乞大谚解·朴通事谚解》,台北:联经出版社.
- [9] 戴光宇. 2011.《兀狄哈诸部落及其分布》,《满族研究》第2期.
- [10] 董万崙. 1993.《〈龙飞御天歌〉记东女真族属与分布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第2期.
- [11] 董万崙. 1994.《〈龙飞御天歌〉记东女真姓氏及部族移动、合流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第3期.
- [12] 恩和巴图. 1983.《达一汉小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13] 冯惟敏. 1981.《海浮山堂词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14] 高葆泰、林涛. 1993.《银川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 [15] 耿世民、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 1999.《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研究》,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 [16] 耿世民、魏萃一. 2010.《古代突厥语语法》,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17] 贺巍. 1993.《洛阳方言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18] 胡和. 1988.《达斡尔语汉语对照词汇》(内部),黑龙江省民族研究所、黑龙江省达斡尔族学会.
- [19] 胡增益. 1986.《鄂伦春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20] 胡增益主编. 1994.《新满汉大词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21] 胡增益、朝克. 1986.《鄂温克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22] 贾敬颜、朱风. 1990.《〈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23] 金启琮. 1996.《爱新觉罗姓氏之谜》,载金光平、金启琮、乌拉熙春编《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第205-211页,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 [24] 开英. 1982.《达斡尔、哈萨克、汉语对照词典》,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25] 李藏柱、刘建洲. 1993.《石家庄地区方言志》,香港:金陵出版社.
- [26] 李树兰、仲谦. 1986.《锡伯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27] 李行健主编. 1995.《河北方言词汇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 [28] 李增祥、买提热依木、张铁山. 1990.《回鹘文文献语言简志》,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
- [29] 卢甲文. 1992.《郑州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 [30] 麻赫默德·喀什噶里. 2002.《突厥语大词典》(汉文版)(第3卷),北京:民族出版社.

- [31] 孟庆泰、罗福腾. 1994.《淄川方言志》，北京：语文出版社。
- [32] 蒲松龄. 1986a.《蒲松龄集·聊斋俚曲集》，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33] 蒲松龄. 1986b.《蒲松龄集·日用俗字》，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34] 钱曾怡、罗福腾. 1992.《淮坊方言志》，淮坊：淮坊市新闻出版局。
- [35] 钱曾怡、张树铮、罗福腾. 2001.《山东方言研究》，济南：齐鲁书社。
- [36] 孙 竹主编. 1990.《蒙古语族语言词典》，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 [37] 王 溥. 1955.《唐会要》，上海：中华书局。
- [38] 王继中. 2013.《凉州方言词语考释》，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 [39] 乌拉熙春. 1996.《满语元音的演变》，载金光平、金启琮、乌拉熙春编《爱新觉罗氏三代满学论集》第319-327页，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 [40] 吴松弟. 1997.《中国移民史》（卷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41] 邢永革. 2009.《冯惟敏散曲的语料价值》，《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 [42] 许皓光、张大鸣. 1988.《简明东北方言词典》，沈阳：辽宁出版社。
- [43] 徐 丹. 2014.《唐汪话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44] 徐 丹. 2018.《中国境内的混合语及语言混合的机制》，《语言战略研究》第2期。
- [45] 徐梦莘. 2008.《三朝北盟会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46] 岩田礼. 1986.《言语地図と文献による语汇史の再构——“ひざがしら”の狭域的/広域的言语地図を中心に》，《伊藤漱平教授退官纪念中国学论集》第47-72页，东京：汲古书院。
- [47] 岩田礼. 2007.《方言接触及混淆形式的产生——论汉语方言“膝盖”一词的历史演变》，*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Vol. 1, No. 2:117-146.
- [48] 岩田礼主编. 2009.《汉语方言解释地图》，东京：白帝社。
- [49] 佚名. 1908.《元朝秘史》（光绪三十四年（1908）叶德辉本）。
- [50] 佚名. 2016.《山海经》，冯国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
- [51] 张建民. 1991.《泰县方言志》，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52] 张美兰、刘 曼. 2013.《〈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53] 张树铮. 1991.《多音节词的语音换位一例》，《中国语文》第3期。
- [54] 张太湘、吴文衍. 1982.《赫哲族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黑龙江文物丛刊》第1期。
- [55] 赵 杰. 1996.《北京话的满语底层和“清音”“儿化”探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 [56] 赵 杰. 2010.《丝绸之路语言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 [57] 赵 展. 1990.《满族源流考》，《黑河学刊》（第3期）。
- [58] 仲素纯. 1982.《达斡尔语简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59] 竹越孝. 2015.《新刊〈清文指要〉：翻字与翻译》，Kotonoha 单刊（10），爱知：古代文字资料馆。
- [60] P. 马克. 1977.《黑龙江旅行记》，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翻译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 [61] Dankoff, Robert, with James Kelly 1982. (ed. and tr.). *Mahmūd al-Kāshgarī Compendium of the Turkic Dialects (Dīwān Luḡāt at Turk)*, Vol. 1. Duxbury: Harvard University Office of University Publisher.
- [62] Janhunen, Juha. 2005. Tungusic: an endangered language family in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173: 37-54.
- [63] Janhunen, Juha et al. 2008. *Wutun*. Muenchen: Lincom Europa.
- [64] Kane, Daniel. 1989. *The Sino-Jurchen Vocabulary of Bureau of Interpreter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 [65] Norman, Jerry. 1978. *A Concise Manchu-English Lexico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66] Starostin, Sergei, Anna Dybo, & Oleg Mudrak. 2003.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Altaic Languages*. Leiden: 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
- [67] Tekin, Talat. 1968.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Language Sciences.
- [68] Tekin, Talat. 1995. *Les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Kul Tighine, Bilghé Qaghan, Tounyouqouq*. Istanbul: Simurg.
- [69] Vajda, Edward J. 2004. *Ket*. München: Lincom Europa.
- [70] Wei, Lanhai et al. 2016. Genetic trail for the early migrations of Aisin Gioro, the imperial house of th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62 (3): 1-5.
- [71] Yan, Shi et al. 2015. Y chromosome of Aisin Gioro, the imperial house of the Qing dynasty.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April: 1-4.
- [72] Иллич-Свитыч, В. М. (Отв. Редактор). 1984. *Опыт Сравнения Ностратических Языков*.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 [73] Тодаева, Б. Х. 1986. *Дагурский Язык*.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 [74] Цинциус, В. И. (Отв. Редактор). 1975. *Сравнительный Словарь Тунгусо-Маньчжурских Языков*. Ленинград: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The Source of *polokai* ‘knee’ in Chinese: Deep Contact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Non-Chinese Languages

XU Dan

[Abstract]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word *polokai* ‘knee’, widely distributed in the dialects of northern China, did not have its sourc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tself, but come from substrate languages spoken by northern populations. It was probably transmitted through the Jurchenized Tungusic people. Historical documents show that dur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Jurchen and Manchu, diverse tribes had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m. The linguistic data shows that the *p-l-k* (*polokai* ‘knee’) pattern in the northern Chinese dialects is likely to be related to the *b-l-g* ‘knee’ pattern in Tungusic languages. The morphological means observed in Tungusic languages may have a deep connection with that found in languages of nomadic, fishing-hunting populations in the North. This word is probably linked to a cognate root *bul-/pal-* shared between these ancient languages.

[Keywords] *polokai* ‘knee’ Tungusic languages a substrate word

(通信地址: INALCO, 63 rue des Grands Moulins 75013 Paris, France)

【本文责编 李云兵】